

一名湖南援藏干部的高原记忆

文良安



西藏自治区山南市贡嘎县境内的雅鲁藏布江流域。
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立亮 摄

八月的风，从雅鲁藏布江的源头吹来，裹着青稞的醇香，拂过布达拉宫的金顶，也吹进了我的心田。当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喜讯传遍神州，我伏案翻开那本泛黄的援藏日记，扉页上“缺氧不缺精神”的字迹依旧滚烫，那些刻在海拔3560米的日子，如同一帧帧鲜活的画面，在泪光里缓缓浮现。

2007年7月，作为湖南第五批援藏干部，我背着行囊踏上了西藏山南的土地。初到高原，寒风像无数根细针，扎得脸颊生疼。稀薄的空气攥着胸口发紧，走几步路就喘得像跑完了全程马拉松。可当我看到地委宣传部办公室里，藏族同事边巴捧着热气腾腾的酥油茶迎上来时，所有的不适都被这份暖意冲淡了——我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我不仅是来履职的干部，更是来与这片土地、这里的同胞共担风雨的“高原人”。

那时的山南泽当许多牧区没通柏油路，走访基层只能靠徒步。记得有一次去隆子县的牧区采访，我跟着牧民的转场队伍走了大半天，脚底板磨出了血泡，高原反应突然袭来，眼前的经幡晃成一片模糊，我踉跄着扶住路边的牦牛粪堆，胸口像压着块巨石。边巴慌忙递来氧气瓶，劝我先回泽当，可我望着远处帐篷里透出的微光，想起牧民们可能正等着我们把政策讲明白、把诉求记下来，便咬着牙摆摆手：“没事，缓一会儿就好，咱们得去看看。”

那天夜里，我们在牧民达娃家的帐篷里围着火炉座谈。达娃老阿妈用藏语比画着，说以前放牧全靠天，遇到雪灾就只能看着牛羊饿死，现在有了政府的抗灾补贴、高原奖补政策。她端来一碗酥油茶，热气氤氲中，我看见她眼角的皱纹里满是笑意，那一刻，所有的疲惫都

烟消云散——我知道，我们踏过的每一步路、熬过的每一个夜，都在让“汉藏一家亲”的暖流，顺着草原的溪流慢慢流淌。

援藏三年，我走遍了西藏的所有地市，磨破三双鞋底，采访本记满了五册，甚至去到了当时全国人口最少的玉麦乡。在玉麦，我见到了守边英雄桑杰曲巴老人的女儿卓嘎、央宗姐妹。她们指着屋墙上“家是玉麦，国是中国”的标语，说父亲一辈子都在告诉她们，要守好这片土地，让五星红旗永远在玉麦的上空飘扬。那天，我们跟着姐妹俩一起去巡边，山路崎岖难行，积雪没过脚踝。

工作再忙，我也没放下手中的笔。夜晚在宿舍，每当夜深人静之时，我会把走访时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感写成文字，慢慢攒成了两本书。这些文字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是青稞地里的守望、雪山上的坚守，是藏族同胞与援藏人共跳的锅庄舞，我想把这些故事写下来，让更多人看见西藏的变化，看见汉藏同胞手拉手的温暖。

如今，离开西藏已经15年，但我始终牵挂着那片土地。这些年，我常常从新闻里看到西藏的新变化：当年徒步才能抵达的牧区，如今柏油路通到了帐篷前，太阳能路灯照亮了转场的路；曾经靠酥油和糌粑度日的家庭，如今超市里的湖南腊肉、酱板鸭摆上了餐桌；玉麦乡也从“三人乡”变成了有学校、有卫生院、有民宿的幸福家园，年轻一代守着国土，也开起了直播，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这个边疆小乡的故事。

前年夏天，我跟着湖南援藏队再访山南。边巴拉着我去看直播间，屏幕里，藏族姑娘正拿着青稞饼干向网友介绍：“这是我们山南的

特产，用湖南援藏队带来的技术改良过，又香又脆！”看着满屏的订单，边巴笑着说：“您当年说想让西藏的特产走出去，现在咱们真的做到了！”那一刻，我忽然湿了眼眶——原来，我们当年播下的种子，早已在高原上长成了参天大树；我们当年许下的心愿，正被一代又一代援藏人、西藏人接力实现。

60年，在历史的长河里不过是弹指一挥间，可在这片高原上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想起援藏时，湖南援藏队带去的杂交水稻，在雅鲁藏布江边结出了沉甸甸的稻穗；想起医疗援藏专家背着药箱，翻山越岭为牧民义诊，让偏远牧区的孩子也能及时看病；想起我采访过的藏族少年次仁，当年他说“要考去湖南读大学”，后来真的考上了湖南师范大学，毕业后又回到西藏，成了一名家乡的教师。

此刻我坐在办公室里，手里捧着当年从西藏带回的青稞粒，窗外是熟悉的湘楚风光，可心里却满是对高原的眷恋。作为一名曾经的援藏干部，我深知，西藏的60年，是汉藏同胞手拉手、心连心的60年，是共同团结奋斗、共同繁荣发展的60年。那些在高原上流过的汗、吃过的苦，早已变成了我生命里最珍贵的财富，提醒我无论身在何处，都要牢记初心、践行使命，像高原上的红柳一样，扎根土地、守望家国。

风吹来，仿佛带着雅鲁河畔格桑花的芬芳。我知道，西藏的故事还在继续，汉藏同胞的情谊还在延续。我始终相信，只要汉藏儿女心往一处想、劲往一处使，西藏的明天，定会像布达拉宫金顶的阳光一样，越来越亮；我们共同的家园，定会越来越美好。

琴声长伴读书人

徐虹雨



采风，洞庭畅游。遥想当年，两位诗人诗酒唱和，何其风雅。

杜牧钦佩李群玉才气，劝他参加科举考试，并写了一首《送李群玉赴举》：“故人别来面如雪，一榻拂云秋影中。玉白花红三百首，五陵谁唱与春风。”杜牧用“面如雪”称赞李群玉英俊洒脱的外表，并用“一榻拂云”典故夸奖李群玉品性高洁。典出《后汉书·陈蕃传》，当时有一名叫周璆的隐士，先后几位郡守招他出山，都不应命，唯独陈蕃能将其招出。陈蕃恭请周璆，专门为他置了一把榻椅，将其抬走，以示诚意与恭敬。杜牧还设想李群玉到达京城之后技压群芳，整个京城将无人能与之唱和。

在杜牧的鼓励下，自称“本不将心挂名利，亦无情意在樊笼”的李群玉终于走出书

院，奔赴科考之路。李群玉清才旷逸，想必当年的他是何等的信心满满。

杜牧不会想到，“群玉诗名冠李唐”的绝世才子会遭遇科考落第。李群玉也异常惊讶，以至游历荆州之时，满怀沮丧写下《登章华楼》：“楚子故宫地，苍然云水秋。我来览从事，落景空生愁。伯业没荆榛，雄图成古丘。沈吟问鼎语，但见东波流。征鸿归乡心，一去何悠悠。晴湖碧云晚，暝色空高楼。迢递趋远峤，微茫入孤舟。空路不堪望，西风白浪稠。”诗歌中，李群玉抒羁旅之愁，更抒人生坎坷之苦。

经历一次落榜后，李群玉不再参加科考，他回到澧州，与堂兄李宣古在文山书院教书。

公元830年，杜棕奉调入朝后，其子裔林、儒林继续留在澧州求学，两个儿子均考中进士，文山书院名声大振。数年后，杜棕官至宰

相，他积极支持书院进一步发展，文山书院成为澧州最高学府。

因培养出两名进士，李宣古声誉鹊起，远传朝野。在杜牧等人的劝说下，李宣古于会昌三年（843年）参加科考，一战高中“卢肇榜进士”，再考又中“宏辞科”，取得了做官的资格。但晚唐社会政治的腐败，让李宣古彻底失望，他回到仙眠洲，从此不再过问功名。他在诗文《张为主客图》中写道：“冉冉池上烟，盈盈池上柳。生贵非道傍，不断行人手。”他为池上之柳感到庆幸，因为不是生长在路边而未被人折断，同时又以柳树喻人，感慨人生如柳当道，易为人伤，人若显达，也难免不测。

李群玉却难以完全做到“本不将心挂名利”。他寄希望于唐宣宗，46岁时，他离开文山书院，徒步前往长安，以山野村民的身份向唐宣宗献诗三百首。唐宣宗称赞“所进诗歌，异常高雅”，赐以诗人“锦彩器物”。不久，皇帝授予他“弘文馆校书郎”。只是，他直言官场腐败，受人诬害，任官四年后，衔冤归乡，苦闷而逝。

也不知，杜牧是否后悔当年力劝李群玉参加科考博取功名，李宣古又是否曾劝说他看淡功名。这些历史的细节，都因时间的流逝而湮灭。

一千多年后，他们三人相聚在常德诗墙。在全国最长的诗书画刻艺术墙上，在“兰芷风华”篇章，刻写着杜牧的《送李群玉赴举》、李群玉的《登章华楼》、李宣古的《张为主客图》。刻写着诗文的石碑静寂无声。立于碑前，我却仿佛听见了文山书院的琅琅书声和袅袅琴音，它们与不远处沅江的涛声一起，跌落在历史的长河里，逐渐又归于平静。

老庚

张德元

乡下日子如田埂上的草，枯了又青，总有些老理儿，老讲究扎在泥里，熬成过日子的滋味。我们这方水土的人情世故里，认亲的法子不少——“结老庚”“拜干娘”“认老家”，数“结老庚”最常见。

“老庚”又叫“同年”，老庚的父母唤作“同年娘”“同年爷”。结老庚的由头则多得很。

讲究的人家，孩子刚出生没几天就请算命先生算，先生若说“命里缺伴儿，得寻老庚搭着才顺溜”，家里人立马托亲带友找八字合的，摆上两碟花生、一壶米酒，让俩孩子磕个头，老庚就算认下了，像给孩子人生系了根平安绳。

更多时候是大人们的心思。住同一地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张家地挨着李家田，谁家盖房缺根料、双抢少个人手，太常见了。结个老庚，像给两家人搭座桥，平时递笑脸、送青菜，遇事喊声“老庚”，对方立马来搭手，亲近得比远房亲戚还实在。

最随性的是孩子。放学路上追着跑，田埂边挖泥鳅，晒得黝黑的小脸沾着泥，突然有人喊：“哎，你也十岁？我也十岁！咱结老庚吧！”另一个扯着嗓子应：“结就结！以后我的果子分你一半！”这就童言，两孩子手拉手在晒谷场转个圈，老庚名分就定了。往后上学同路，放学一起掏鸟窝，书包里的糖总掰成两半分，谁被欺负了，另一个攥着拳头就冲上去，比亲哥俩还护着。

还有孩子见邻居家孩子跟老庚腻在一起，掏心窝说悄悄话，上山摘野果总想着留一把，就拉着娘衣角撒娇：“我也要老庚！我也要有人跟我一起爬树！”娘笑着拍他：“自己找去！”孩子便屁颠屁颠挨家问“你多大”，遇着岁数差不多的，死缠烂打也要认下，执拗得像要抢宝贝。

老庚的花样也千奇百怪。有同年同月同日生、时辰都不差的，村里人叹“老天爷牵的线”；有差三两月的，说是“同年”，更像哥俩姐妹；有差一两岁的叫“扯子老庚”，硬把时光扯一块儿，倒也亲；甚至有小姑娘和小男孩结老庚的，多是小时候不懂事，觉得“他会爬树，我会摘花，正好搭伴”，长大了也就笑笑作罢。

老庚的情分像地里的蔬菜：有的春种秋收，热乎阵子就忘；有的挨过三两个寒冬，一起摸过邻居家的瓜、在晒谷场睡过觉，可长大了各奔东西就淡了；但极少数能扛过几十年风雨，从穿开裆裤的娃娃到头发花白的老人，情分比陈年的酒还醇厚。

山关村曾有对实诚老庚——贺祖生和仔乃麻子。仔乃麻子走了三十多年，贺祖生也离世十三载，可他俩打小认老庚、守了一辈子情分的事，还偶尔在村里人闲谈时飘出来。

贺祖生人高马大，浓眉大眼，说话像打雷，不笑时自带威严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了大队书记，往大队部门口一站，社员就知他靠谱。他只上过识字班，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，记忆力却极强，公社开会不用记笔记，回来开支部大会传达精神，能一字不差说清楚。他性子直、有主见、肯吃苦、办事公道，身边人都叫他“大哥”——是认资历、能力的亲昵称呼。凭这些，他把大队长、大队书记当了个遍，在大队任职几十年。家里媳妇手脚勤快、性格开朗、为人大方。虽没亲生儿女，过继了个儿子，如今孙子三个、曾孙不少，逢年过节家里热热闹闹，是村里人羡慕的光景。

跟贺祖生站一起，仔乃麻子就像被太阳晒缩了水。他高不过一米五，小眼睛眯成缝，厚嘴唇微张，脸上坑坑洼洼，还有一条腿粗、一条腿小且短些，走路活像踩高跷在田埂上挪，看着揪心。他有过一段婚姻，后来媳妇跟着算命的汤瞎子跑了。此后仔乃麻子就一个人住泥土小屋，屋子低矮，风一吹像要晃。大队人多叫他“仔乃麻子”，大名只知姓刘，具体叫啥没人在乎。

没人知他俩小时候咋认的老庚，但村里老人都记得他俩从小就好。贺祖生小时候就护着仔乃麻子，谁家话仔乃麻子走路难看，他攥拳就上去，能把人打得鼻青脸肿。仔乃麻子虽不会干农活，总想着给贺祖生攒好东西，春天挖的野菜、秋天摘的果子，都偷偷放贺祖生家门槛上。

后来贺祖生成了大队支书，风光得很。有人背后嘀咕：“贺书记现在不一样了，还认这穷老庚？”可贺祖生还是老样子，每年过年，他让媳妇做好饭菜、炸好油货，自己提篮子往黄私屋走，泥路难走也从没断过。端午做了艾蒿或粽子，中秋做了月饼，总让儿子给仔乃麻子送一份，有时干脆喊仔乃麻子到家吃饭，同桌坐着像寻常兄弟。

仔乃麻子说话不利索，更不会说好听的，只贺祖生去时咧着厚嘴唇笑，把屋里仅有的好椅子推给贺祖生，自己坐门槛上，眯着眼听贺祖生说生产生活的事，说孙子多调皮。

后来贺祖生卸了支书担子，头发白了、背驼了，仍惦记着仔乃麻子。1986年一天，仔乃麻子在乡里养老院没气了，贺祖生亲自张罗丧事。

那几天贺祖生忙前忙后弄棺材、找墓地、请人抬棺，一点不含糊。出殡那天，五十多岁的他跟在队伍后慢慢走，陪陪了自己大半辈子的老庚最后送段路。

村里人看着都叹气——这老庚情分有始有终，像山里的树扎在土里，再也拔不掉。对贺书记的人品，更是打心底佩服。

如今田埂上的草枯了又青，村里结老庚的少了。可贺祖生和仔乃麻子这对老庚的事还在山关村传着。

像田埂边悄悄长的野菊，不显眼却经得住风吹雨打，闻着有干净的香。想起他们，便记着乡土里的牵绊原能这么深厚，人与人的情分真能经住岁月和境遇，像陈年井水，清冽冽甜到心里头。